

高龄化下的代间关系

——台湾民众孝道信念变迁趋势分析(1994 - 2011)

曹惟纯 叶光辉

提要:本研究以华人孝道双元(相互性及权威性)模型为基础,采用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计划跨17年(1994 - 2011年)的大型数据,运用多层次线性模式之“交叉分类随机模型”,进行“年龄—时期—世代效果分析”,以更严谨方式检验近年台湾社会孝道观念的重要性是否随时期产生变迁,并从代间互动关系转型角度来探讨时期效应的深层意涵。研究结果显示:在现代化与民主化历程下,台湾亲子代间关系的运作本质虽稳定呈现以相互性孝道为核心的类平辈关系,但受到近期社会人口高龄化趋势的影响,亲子代间互动的运作逐渐朝“契约式关系”发展,呈现出双元孝道的重要性皆随时期上升的变化趋势,且权威性孝道上升幅度高于相互性孝道。

关键词:孝道双元模型 社会变迁 代间关系

一、绪 言

孝道作为华人社会具代表性的文化价值,不仅反映了华人亲子代间互动原则,更同时统摄辈分、年龄与性别阶序,支持家庭功能的运作与继续,其作用效果甚至可泛化到其他社会关系上(如对高龄族群的态度),因此它在华人学术社群中始终是备受关注的研究主题。尽管探讨孝道议题时总不免触及它在当代华人社会的变迁情形,但既有孝道变迁研究多半存在以下问题:(1)针对传统孝道演化过程进行理论分析者,仅着重现代化或西化历程对传统孝道的影响,但对于不同华人社会特定的历史文化脉络,以及晚近新兴社会趋势可能促成的孝道变迁方向则甚少着墨;(2)以社会调查资料进行实征研究(empirical study)者,除了受限于跨时间资料搜集不易,在界定孝道测量内容与解读分析结果意涵上,多半欠缺合适的理论基础,导致研究结果分歧或流于数据导向的结果报告。为了贴切掌握当代台湾社会的孝道变迁趋势,本文采用孝道双元模型(Dual Filial Piety Model,参见 Yeh, 2003; Yeh & Bedford, 2003)作为理论依据,借助其在孝道概念化上兼具亲子

代间关系运作特征、儒家伦理展现形式与反映社会变迁意涵之优势,形成具体研究架构,并仔细爬梳当代台湾社会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及其对孝道变迁的可能影响,据以解读数据分析结果。另也配合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计划资料之特性,运用新兴的多层次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对重复性横断面数据进行“阶层式年龄—时期—世代模型”(Hierarchical Age-Period-Cohort Model, HAPC 模型)分析,由不同层次的时间影响效果深入探讨台湾民众孝道信念的变迁及其意涵。

(一) 当代孝道的双元面向及其变迁意涵

孝道作为华人亲子互动的基本准则,原就涵盖各种具体行为表现,且这些具体行为的意涵与价值亦会随着外在脉络的变迁而出现变动或转化,惟有从亲子代间揉合垂直(“父母”—“子女”这一家庭角色对偶组的阶序关系)与水平(基于亲代与子代身为两个独立个体所形成的对等互动关系)双元关系的本质切入,才可能对孝道提出贴切的概念化。孝道双元模型即是基于亲子代间关系的双元特性,由“亲子代间运作基模”的角度切入,以相互性、权威性两个面向来界定孝道。

相互性孝道(Reciprocal Filial Piety)的运作基础是源自于亲子间亲密的关系连结与自发的情感表现,其发展来自于子女与父母日常互动中逐渐累积出厚实情感,并形成最根本的人际亲和状态,因而在普遍状况下,子女均能相应表现出善待、关怀父母的心态与行为。由于亲子两代在此种情感互动历程中具有对等地位(两个独立个体的互动),遂以“相互性”命名。相互性孝道的运作性质不仅对应于儒家伦理中的“亲亲”原则,也和现代社会中强调双方平等且仅以彼此情感为基础的“纯粹关系”(pure relationship; Giddens, 1992)相呼应。另一方面,权威性孝道(Authoritarian Filial Piety)的运作基础则是通过对角色规范的遵从来寻求社会认同。由于亲子双方在关系初始时必定处于权力不对等的关系结构下,且父母在子女社会化历程的特定阶段中无可避免会成为子女眼中具有权威的“角色楷模”,因此权威性孝道信念与行为是源自于子女以符合社会规范的形式来满足父母的要求或期待。然而,父母的权威往往随着子女迈入青少年阶段而逐渐减弱,因此传统华人文化中发展出一套“家国同构”的社会体系,用以强化奠基于“辈分—年龄—性别”伦理阶序上的“阶级”权威。以“权威性”来命名这一孝道向度,不仅点出亲子对偶关系是华人社会权威结构的基础,同时也突显出

子代遵循角色规范以追求社会认可的心理运作机制。在权威性孝道的运作原则下,子代必须认同亲子辈分地位之尊卑规范,才能在亲子关系中达成合宜的实践,恰对应于儒家伦理中的“尊尊”原则,因此常涉及与自我压抑、顺从权威相关的心理与行为表现。

相互性与权威性孝道虽在运作特征上有所区隔,但彼此并非对立互斥,亦非分属于不同时代之文化产物。由于这两类孝道面向代表子女与父母互动时的心理运作基础,无论在传统或现代社会中两者皆同时并存。由前述双元孝道与儒家文化展现原则的对应说明可知,两类孝道向度在华人历史上源远流长,且同时交织于整体社会文化脉络中;当代实证研究结果也一致发现双元孝道间具有中度的正相关(叶光辉,2009a, 2009b)。可见,即使历经各种大规模的社会结构变迁,孝道的双元面向始终在华人社会中普遍共存。而各种外在脉络因素的影响则体现为相互性与权威性两个孝道向度在当时社会中受重视程度的差异(叶光辉,2009b),换言之,外在环境脉络的改变并不表现为特定孝道向度的存废与否,而是显现于双元面向在当时社会相对比重的变化;至于两个面向的实际消长,则取决于特定期之社会主流趋势与哪个孝道面向较为契合。以往对孝道观念的历史分析显示:先秦时期较重视相对性的伦理本质与孝道所蕴含的自然天性,故此时期的孝道以相互性面向为运作核心;而汉至清朝之间,随着家国同构与忠孝混同的政治建制兴起,亲子自然情感与社会体制高度结合,衍生出基于尊卑纲纪的“绝对主义伦理观”,孝道的核心也逐渐移转到强调顺从尊长的权威性面向(徐复观,1975; Yeh, 2003)。因此,孝道双元面向受重视程度的消长变化并无既定或单向的转型路径,而是随时反映特定时期的社会脉络变化,即使汉至清朝间的孝道观念皆偏重于权威性面向,但其比重仍会因为不同朝代的法令与社会气氛而出现波动,例如宋、明律法中对不孝之人的刑罚趋于严苛,促成了孝道极权化(陶希圣,1983),权威性面向的比重也在此时期达到最高峰,然而此时相互性孝道的重要性虽大幅削弱,却仍是支撑孝道观念运作的基本成分。

值得注意的是,在任一时期较占优势的孝道面向,除了相对重要性较高、运作范畴较广,也可能将另一类孝道面向涵盖于其下,造成隐微的意义转化,例如黄何明雄、周厚萍(Wong & Chau, 2006)在香港进行的深度访谈研究发现,担任年迈父母主要照顾者的成年子女多半强调,他们之所以长期亲自照护罹患慢性病或行动不便的父母,主要是出于

个人对父母的深厚情感而非传统规范的要求,在此即显示出相互性孝道观念在当代的优势:原本多由子女角色义务加以解释的“随侍在侧”的表现渐渐被当今作为孝道核心意涵的“自然情感”所渗透。因此,在探讨孝道变迁时,仍须厘清当时环境下双元孝道面向的相对优势,才能明确掌握两者细部的运作意涵。此外,孝道双元面向的消长亦可由两者与人口变项的关联性加以反映:较占优势的孝道面向为社会大众普遍认同,因此不同人口分群对其接受程度应无明显差异,即各种人口变项对其受重视程度的预测力较不显著;反之,处于非优势或辅助地位的孝道面向表明其运作已受到局限,仅部分人群(如男性、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等)认同其重要性,因此特定人口变项对其预测效果较为显著。若能进一步细究各种人口变项性质及其对双元孝道面向的影响效果差异,应有助于推敲当时双元孝道的消长与社会变迁间的可能关联。整体而言,孝道双元面向在理论上的区隔对反映社会变迁趋势有一定的敏感度,不仅可与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脉络相连结,也可对双元孝道的相对重要性提出实质解释,更可深入探讨“相互性”与“权威性”面向交互形塑的模式如何影响孝道意涵的转化与演进。

(二)从亲子代间关系转型角度回顾台湾孝道变迁之社会脉络

台湾既有的孝道变迁实征研究几乎都集中于探讨现代化历程对孝道观念的冲击,且多半使用1990年以后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台湾社会在晚近阶段的变迁方向已与由传统社会过渡至现代社会的關鍵转型历程有所不同。事实上,相关学者多认为,台湾社会现代化肇始于日本统治时期(1895-1949年间)推动基础建设、改革农业与糖业、建立金融体系与普及法治观念等方面的进展(林秀玲,2000),而台湾社会整体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大约始于1965年(萧新煌,1995),其后20年间则经历经济起飞、政治民主化及社会自由化等密集发展阶段,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整体现代化转型已渐趋稳定。从联合国为评估各国(地区)整体发展程度所设的人类发展指标(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来看,1990年台湾的HDI不仅高达0.83(最大值1)、世界排名第23位,且已符合高度发展之标准(台湾“行政院”主计处,2005)。因此,使用20世纪90年代迄今的调查数据进行变迁研究时,不宜再以现代化转型作为惟一解释脉络。以下对孝道变迁脉络之回顾,将涵括台湾过去约60年间的社会发展情况,除了以现代化进

程作为说明主轴,更着重于与孝道或家庭功能密切关联的历史文化脉络或社会政策,并从代间关系转型的角度来具体说明各种脉络因素对双元孝道面向的可能影响。

1949年国民党迁台后随即颁布戒严令,随后的单一政党统治持续了40年,台湾社会就在这一长期脉络下逐步达成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因此既有孝道观念在这一渐进式的社会转型历程中并未出现明显断裂,而是与时俱进地随社会变迁持续运作。国民党退至台湾后,为了强化其作为“中华文化正统”之地位,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于台湾大力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提倡传统价值在新时代的可能应用与发展。当时提出的新孝道观点虽强调孝行的表现应基于个人原则而非传统体制下的固定标准(杨国枢,1985),但孝道观念的教化却随着1968年国民义务教育的实施成了学校系统下制式科目的教学内容,且与强调中华文化遗产的意识形态紧密结合(陈锦燕,2006)。另一方面,由于战后婴儿潮使台湾社会人口大幅增长,主管机关于1970年起开始推动计划生育,此项政策不仅使家庭子女数降低、家庭结构趋向核心化,更营造出有助于亲子情感沟通、进而促使相互性孝道发展的外在条件;其中“男孩女孩一样好”之倡导口号,对于削弱父系体制的传宗接代观念也有一定的影响。而在1987年政治解严后,社会风气在追求全面民主化风潮下更趋开放,社会转型趋势大致确定。综合而言,1949年至90年代初期,正是双元孝道由传统社会过渡至现代社会的关键期,在前20年间,相互性孝道面向虽隐约成为政策关注焦点,但社会体制的基本运作仍与权威性孝道密切结合;直至1970年后家庭结构转型与民主化思潮兴起,孝道的核心意涵方从“对父母权威的顺从”逐渐转化为“亲子间生活情感的展现”,亦即亲子代间关系的本质已由“强调角色阶序的伦常关系”逐渐转向“与现代性特征相应的纯粹关系”。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研究结果(林文瑛、王震武,1995)即指出,当时台湾父母对亲子关系本质的看法已倾向于“类平辈关系”,意即将子女视为朋友,着重彼此间的亲情更甚于“长幼尊卑”的角色互动。

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台湾社会已进入后期现代化,社会变迁重点在于价值观的细部转化,其中又以横跨90年代的10年教育改革对孝道变迁的影响最甚。其间,传统师生间类父子式的上下关系遭受人本教育理念的冲击,威权式的教育形态转变为对学生个体性与独特性的强调,连带使各种人际关系的平权化更为明显,此时双元孝道中

的相互性面向持续居于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台湾社会的老年人口比例自1993年起就已超过7%,成为联合国界定的高龄化社会,且老化的速度持续增快(台湾“行政院”经建会,2006)。此一高龄化趋势与全球金融危机共同冲击着台湾家庭的养老功能,不仅老人遭虐待与弃养的比例逐年上升(台湾“内政部”统计处,2010),而且多数民众也开始认为老人的生活需求与医疗照护不应由家庭独力负担(傅仰止、张晋芬主编,2007)。为了因应上述老人福祉相关议题,台湾主管机关一方面开始着手规划老人福利制度,一方面则通过政策倡导孝道,以维持家庭基本的养老功能。与早期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不同的是,这一波政策诉求结合高龄化社会脉络,紧扣实务性议题,因此主管机关所倡导推广的理念除了更重视将孝道落实于日常生活,也不再区别不同性质的孝道内涵,仅以强化代间凝聚力或家庭功能为主要目标,例如台湾“教育部”2010年发起的“祖父母节”活动即强调尊亲敬老(台湾“教育部”,2010a),而近期蔚为风行的“学童读经班”活动中,亦以可彰显传统儒家伦理或宗教劝世意涵的孝道经典为主,这些活动皆与权威性面向有较多呼应;至于学校体系下的孝亲楷模选拔,则一改长久以来对自我牺牲式极端孝行之推崇,转而注重親子间双向对等之良好互动(台湾教育部,2010b),突显出对相互性孝道运作范畴的重视。此外,台湾多位不同党籍的立法委员于2001年亦曾联合提出以“维护传统孝道”为诉求的“子女奉养父母法草案”,迄今仍在持续推动正式立法。尽管上述社会趋势看似不断强化权威性孝道的合法性,但细究其意涵,未必单纯等同于“重视角色阶序的传统孝道”再次复兴,而是促使双元面向中有助于合理化奉养义务且符合当代民主思潮的各种孝道成分重新揉合,使親子双方的权益皆能达到最大化。其中,相互性面向隐含的平等与互惠理念更为重要,而权威性面向的强化也仅止于对家庭/家族整体福祉方面的强调,而非退回到对家庭角色阶序的服从。本文认为此种孝道变迁方向将促成“契约式代间关系”之发展。事实上,“代间契约”原就是一般人理解子女奉养责任之合理性时普遍采纳的内隐概念(Bengtson, 1993),亦即亲代与子代各自通过养育未成年子女和奉养年老父母来满足彼此在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时的生活与照顾需求;然而此种内隐的反馈式伦理多半诉诸于道德、情感基础,以淡化其中以权益交换为原则的契约本质(Chou, 2011)。本文所指称的契约式代间关系,即反映代间关系的契约本质随着外在政策的改变而逐渐被揭露,甚

至具体化、定型化,促使代间关系的运作准则转换为西方契约伦理文化在立约双方关系上所强调的独立、平等、自由等精神,以及履行契约的义务;其与纯粹化或类平辈代间关系最大的差异在于,契约式代间关系的情感亲密度会逐渐降低,符合理性的公平原则会更为重要,而子女对父母的奉养主要是基于法令或具法律效力之协议所规范的社会责任。近期台湾有关老人居住安排转换行为的研究发现:孝道价值观与涉及经济考虑的社会交换理论皆会影响代间同住的决策结果,且交换理论的影响力在 1989 - 1996 年间有日趋增强的趋势(张桂霖、张金鸢, 2010)。此一实证证据显示,自 1990 年起,台湾的代间关系可能已开始朝契约式关系过渡,因此探讨孝道变迁及其意涵时不应忽视此项脉络因素。

根据上述社会历史文化脉络之分析可知,台湾民众孝道信念的变迁反映出亲子关系的两度转型:在现代化、民主化趋势对孝道的影响下,相互性面向受重视的程度逐渐高于权威性面向,并促成代间互动本质由角色阶序关系转型为强调个人情感的纯粹关系;而近期的人口高龄化、全球经济衰退等趋势主要从对年老父母的赡养照护层面冲击着台湾民众的孝道信念,尤其目前推动立法规范子女奉养义务的政策走向可能会削弱相互性面向下自发性的情感关怀、支持等成分,使亲子关系开始朝向契约化关系发展。

(三)应用多层次线性模式交叉分类随机模型之“年龄—时期—世代”效果分析

各种社会变迁相关研究旨在确认时间(时期)造成的变化趋势,但时间在各种社会调查数据中其实具有多重层面的作用效果,其中包含:(1)由个人生命时间改变造成的“年龄效果”,即通过年龄差异反映出与个人成长发展周期进程、人生经验累积有关的时间变化效果,同年龄层个体存在跨越时期、世代、地域的相似性;(2)由历史时间改变造成的“时期效果”,即通过调查执行或搜集资料年代之差异,反映出与社会、经济、文化或物理环境之演进发展有关的时间变化效果,对于在同一时间点接受调查的所有样本都会造成影响;(3)由上述两者交互形成的“世代效果”。世代意指通过人为判断将出生于相近年代的人们划分为同一群体,由于不同世代在其出生或成长的历史时间点上分别面临特定的历史事件或社会环境,若划分得宜应可确实反映出各世代

间的异质性。上述三种层次的时间效果在以往的孝道变迁研究中经常相互重迭、混淆,例如仅以单一时间点数据进行分析时,年龄与世代效果无法清楚切割;即使采用跨时期资料,年龄、时期与世代仍存在完全共线性(“数据搜集年代/时期”减去“样本出生年代/世代”等于“样本年龄”),在一般回归模型中无法同时分析三者的个别效果。因此,既有的孝道变迁研究在探讨上述任一种时间效果时,往往未严格控制其余两类时间效果的影响,导致分析结果不够完整,其中又以世代效应最易遭受忽略。

早期由流行病学或人口学领域所发展的“年龄—时期—世代”分析模型(Age-Period-Cohort Model),仅适用于处理总体数据(如死亡率),直到近年杨与兰德(Yang & Land, 2006, 2008)才发展出可就个人层次调查数据进行“年龄—时期—世代”分析之统计方法,以新兴的多层次线性模式(Multilevel or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处理一般大型社会变迁调查常见的“重复性横断面设计”下数据本身的嵌套(nesting)特性。由于在重复性横断面资料中,不同年代接受调查的所有样本均彼此独立(非针对个人进行长期追踪),且其资料均同时嵌套于“时期(调查年代)”与“出生世代(依个人出生年代所划分的世代组)”两个分类单位之下,亦即若合并不同调查期次之资料,则其中每个样本都只会归属于某一时期与某一代代之下。通过将“时期”与“世代”界定为位于个体层次之上的高阶(细格层次)分类单位,即可成功区分年龄(属于个体层次的)、时期与世代的效果。由于“时期”与“世代”位于数据结构的同一层次(即两者相互独立,并无嵌套关系),整体数据只有两个层次:第一层为个体层次,第二层则同时有“时期”、“世代”两个彼此独立的交叉分类单位,实际分析时可直接采用多层次线性模式中的交叉分类随机模型(Cross Classified Random Effect Model, CCREM),针对不同层次的时间效果加以探讨。此分析方式的发展不仅为社会变迁提供了新研究取向,且可进一步在时期层次中纳入对应的解释变项,直接以实征数据检验时期变迁趋势背后的可能成因,对于社会变迁理论发展具有相当的帮助。由于已有系列研究(如 Yang, 2006; Yang & Land, 2006, 2008)使用多笔实征数据作为分析范例,此处不再赘述“交叉分类随机模型”之计算原理、模型设定等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径行参考上述文章。

为了善用“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计划”之资料特性,从年龄、时

期与世代三种层面的时间效果共同探讨台湾民众孝道观念的变迁,本文将采用上述交叉分类随机模型进行分析。目前台湾应用此分析方法之研究(如周玉慧、朱瑞玲,2008)多半沿袭在出生年代的基础下以特定年数间距作为世代分组依据(如每隔5年为一个世代组),但此种分组方式难以反映不同世代背后的集体历史与生活经验差异。为了弥补过往孝道变迁研究对世代效果的长期忽略,本文选择在西方研究发展的世代名称系统下,另以台湾社会重要的社会与历史标记为依据,调整各世代组的时间切点,以兼顾世代划分方式的本土契合性与易理解性。目前所区分出的4个世代依序为:(1)传统世代(出生于1929-1949年间):以1949年国民党迁台为时间分割点,主要成长于日本殖民统治下,价值观相对保守,较强调亲子间奠基于辈分、年龄与性别之家庭角色阶序,是最重视权威性孝道的世代;(2)婴儿潮世代(出生于1950-1964年间):此世代在国民党威权统治气氛与贫困环境中成长,价值观虽偏向保守,但由于进入职场时适逢台湾经济起飞,他们在生活与价值观上的现代化程度均比传统世代高,因此对传统家庭角色阶序的重视开始减弱,并逐渐认同亲子间对等的互动模式;但婴儿潮世代多半生长于大家庭环境,仍倾向认为家庭整体福祉与情感凝聚力优先于个人利益,尽管其对权威性孝道的重视程度不如传统世代,但其孝道信念的运作仍以权威性面向为主;(3)X世代(出生于1965-1979年间):此世代以经建计划四期开始施行之年份(1965年)为起点,生长于台湾社会经济起飞与开始追求民主改革的阶段,在此期间,台湾社会虽渐趋价值多元化,但仍处于转型中的过渡状态;与先前的世代相较,X世代对权威性孝道的认同已大幅减弱,且在家庭规模逐渐缩小的趋势下,也更重视亲子间平等、亲密的纯粹情感关系,而非以集体福祉或凝聚力作为代间情感的运作核心,因此X世代的孝道运作核心已逐渐转移至相互性面向;(4)Y世代(出生于1980-1992年间):此世代以1979年台美断交与美丽岛事件为时间分割点,出生时台湾家庭计划已推行10年,小家庭已成为社会主流(Tung et al., 2006),且政治气氛亦随着解严而有实质的开放与转变;由于Y世代生长于高度个人化、自由化的家庭与学校环境中,强烈的个人主义取向除了使其成为最不认同权威性孝道的世代,也连带削弱其对亲密情感的重视,而仅关注亲子关系的运作是否符合平权原则,因此其对相互性孝道的重视程度反而低于X世代。

(四) 研究架构特色与研究假设

为了兼顾不同层面的时间效果对孝道变迁之影响与重复性横断面调查资料之特性,本研究运用多层次线性模式之交叉分类随机模型进行“阶层式年龄—时期—世代效果分析”,整体研究架构特色包含:(1)在控制其他层次各种可能的影响来源下,以更严谨的方式检验近 17 年来纯粹时期效应对台湾社会孝道观念变迁之影响,并从代间关系转型之角度探讨其意涵。(2)在个体层次同时纳入年龄与年龄平方两个预测变项,以便进一步确认年龄效应与孝道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3)参考孝道双元模型的理论观点与既有研究结果(见叶光辉,2009a),选用与孝道具有密切关联的人口变项作为个体层次的解释变项(包含性别、婚姻状态、个人教育程度、家户每月总收入、家户总人口数)。在模型中纳入这些个体层次解释变项,除了可就更严格的控制条件来检验影响台湾民众的双元孝道信念变迁纯粹的时期效应及其变化趋势,还可同时比较个体层次不同人口解释变项对双元孝道之预测效果,为孝道变迁原因提供另一种形式的信息。(4)虽然本文关注焦点为纯粹时期效应,但为了对世代效应检验结果提出更具体且有意义的讨论,本研究特别参酌台湾本土的历史文化脉络来划分世代组。

在孝道双元模型理论基础下,本文对台湾民众孝道信念之变迁提出下列具体研究假设:

(1)对双元孝道相对重要性之分析:现代化与民主化历程对台湾民众孝道观念的影响至 20 世纪 90 年代已渐趋稳定,当代孝道信念的核心已转移至相互性孝道,因此在各期次数据中,相互性孝道信念的相对重要性均稳定地高于权威性孝道信念(假设 1)。

(2)对不同层次时间效应之分析:就年龄效果而言,由于当代孝道运作的核心已转移至相互性面向,各年龄层对相互性孝道的重视程度应无明显差别,因此年龄效果应只显现于权威性孝道上,亦即年龄变项只在权威性孝道信念上具有显著预测效果(假设 2-1);就世代效果而言,台湾民众对相互性孝道的重视程度应大致随世代演进呈现先升后降的效应(至 Y 世代后开始下降)(假设 2-2),对权威性孝道的重视程度则呈现随世代演进而渐次下降之趋势(假设 2-3);至于在时期效果上,由于近 10 年来台湾社会人口高龄化趋势与相关政策之走向主要促成亲子代间互动的运作

本质朝“契约式关系”发展,台湾民众对双元孝道的重视程度应同样呈现出随时期而上升的变化趋势,且权威性孝道上升的幅度会高于相互性孝道上升的幅度(假设2-4)。

(3)在交叉分类随机模型中,个体层次其他人口解释变项对于权威性孝道的解释效果应高于相互性孝道,亦即男性(反映对父子轴优势结构的重视)、已婚者(反映个人婚恋态度较保守)、个人教育程度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反映个人价值较传统保守)者、来自大家庭者(反映传统大家庭结构对人际阶序的强化)应较重视权威性孝道(假设3)。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源与样本筛选程序

研究资料来自“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计划”。该计划为重复性横断面调查,各调查主题每5年循环一次,自1984年起每年均以台湾成年民众为母群,并根据该年度台湾地区人口统计资料,采用分层三阶段(第一段抽出单位为乡镇;第二段为村里或集群村里;最终段为个人)机率抽样法(stratified three-stage 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sampling)抽取研究样本,持续针对不同的社会变迁面向累积具全台湾代表性的大样本调查数据。这是目前最适用于探讨台湾社会变迁的大型调查数据库。

虽然孝道课题在一至六期的调查计划中均被纳入测量,但为了避免测量方式异动造成混淆,本研究主要采用其中孝道测量题数与量尺值完全相同的期次进行分析,共包含二期五次文化价值组问卷(1994年)、三期五次文化价值组问卷(1999年)、六期二次家庭组问卷(2011年)这3个时间点的数据。上述三期次数据的原始样本人数依次为1853人、1948人、1939人,为减少结果解释上的困扰,只要受访者在任一分析题项(包含孝道题项与选用的各人口变项)中含有遗漏值或不明作答项(例如:无意见、不了解题意与不愿意回答等),就一律加以排除,因此,最终正式纳入分析的样本总共4411人,其主要人口组成特征请见表1。

表 1 正式样本组成结构

	调查期次			总和
	二期五次 (1994 年)	三期五次 (1999 年)	六期二次 (2011 年)	
世代				
传统世代(生于 1929 - 1949 年)	365	376	234	975
婴儿潮世代(生于 1950 - 1964 年)	723	676	436	1835
X 世代(生于 1965 - 1979 年)	255	546	443	1244
Y 世代(生于 1980 - 1992 年)	0	0	357	357
性别				
男	648(48.3%)	857(53.6%)	779(53%)	2284
女	695(51.7%)	741(46.4%)	691(47%)	2127
年龄				
19 - 29 岁	255	365	297	917
30 - 39 岁	482	414	276	1172
40 - 49 岁	369	443	328	1140
50 - 59 岁	156	199	269	624
60 - 72 岁	81	177	300	558
平均年龄(岁)	39.35	40.84	44.49	—
整体样本数	1343	1598	1470	4411

(二) 研究工具

1. 主要研究变项：双元孝道信念

本研究选用的三期次数据均使用“双元孝道九题短版量表”(Yeh & Bedford, 2003),此量表为具有理论基础且经严谨心理计量程序发展的孝道测量工具,在不同华人社会样本中普遍获得信度、效度实证支持(叶光辉,2009b)。其中共有 4 题测量相互性孝道,主要反映子女基于长期累积的亲子亲密情感,自发地表现出对父母的感恩关怀,例如:“对父母的养育之恩心存感激”、“奉养父母使他们生活更为舒适”等;另有 5 题测量权威性孝道,主要是反映基于家庭中“辈分—年龄—性别”阶序衍生的子女角色义务,实际内容如:“放弃个人的志向,达成父母的心愿”、“为了传宗接代,至少生一个儿子”等。测量方式是请受访者评估各题叙述内容的重要程度,采用 5 点量尺计分,以 0 到 4 分代表“不重要”到“绝对重要”,得分越高表示个人越重视该孝道信念。经主

轴因子法(principal axis factoring)进行因素分析并使用 promax 斜交法转轴,这 9 个题项在三期数据中都稳定地得到了与理论预期相一致的两因素结果,再次验证了二元孝道模型的理论观点。而两孝道因素个别的 Cronbach's α 值在各期次的分析结果亦相当稳定,在相互性孝道因素上依次为:0.86、0.73 与 0.73,在权威性孝道因素上依次为:0.77、0.71 与 0.68,两孝道因素各自内部一致性信度皆相当不错。

2. 个体层次人口解释变项

(1) 年龄:以“调查执行年度”减去“受访者出生年度”计算而得。

(2) 年龄平方:年龄变项自乘,以检验年龄与依变项间的非线性关系。

(3) 性别:二分变项;0 代表女性、1 代表男性。

(4) 婚姻状态:二分变项;0 包含已婚、配偶去世、同居等状态,1 包含未婚单身、离婚、分居等状态。

(5) 个人教育程度:分为 7 等级,数值越大代表教育程度越高;1 为“无教育或不识字”,2 为“自修/识字/小学”,3 为“国、初中/初职”,4 为“高中普通科/高中职业科/高职/士官学校”,5 为“五专/二专/三专/军警专科班/空中行专”,6 为“空中大学/军警官学校/技术学院、科大/大学”,7 为硕、博士。

(6) 家户每月总收入:分为 9 等级,数值越大代表收入越高;1 代表“无收入”,2 代表“未满两万”,3 代表“2 万以上未满 4 万”,4 代表“4 万以上未满 6 万”,5 代表“6 万以上未满 8 万”,6 代表“8 万以上未满 10 万”,7 代表“10 万以上未满 15 万”,8 代表“15 万以上未满 20 万”,9 代表“20 万以上”。

(7) 家户总人口数:依受访者自陈的同住家庭成员,计算目前同住的总人数(含受访者在内)。

3. 细格层次交叉分组变项

本研究采用交叉分类随机模型,将“时期”、“世代”设定为个体层次之上的细格层次分组变项,由于时期与世代在数据性质上位于同一层次,故采用交叉分组方式,依照受访样本所属的调查期次与其出生年度,将所有样本在细格层次区分为 12 组(各细格人数分配详见表 1)。

(1) 时期:依调查执行年度,共分为 1994 年、1999 年、2011 年 3 组。

(2) 世代:同时参考西方研究对“世代”的区分方式以及台湾社会文化脉络下有意义的时间分割点,区别出 4 个世代组:其中出生于 1929 - 1949 年间者属于价值观保守的传统世代;出生于 1950 - 1964

年间者是普遍生长于大家庭环境的婴儿潮世代；出生于 1965 - 1979 年间者归为在台湾社会转型期间历经价值体系混乱而成长的 X 世代；出生于 1980 - 1992 年间者则为生长于高度自由化与个人主义氛围下的 Y 世代。

(三) 分析程序与模型设定

第一部分先以三期次资料个别进行各孝道题项得分之描述统计、相互性与权威性孝道得分差异之相依样本 T 检定, 检验双元孝道在各调查期次下的相对重要性, 以确认台湾社会在历经 20 世纪 70 - 80 年代间的现代化、民主化过程后, 是否已稳定呈现出“以相互性面向为核心”的孝道运作模式。此外, 亦分别针对两类孝道信念跨期次的得分差异进行单因子变异数分析(ANOVA), 以了解两类孝道近 17 年来的变迁概况。

为配合重复性横断面调查资料的性质, 对双元孝道跨时期的变迁趋势有更精确的掌握, 第二部分则通过多层次线性模式中的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CCREM), 进行“阶层式年龄—时期—世代效果分析”, 分别从不同层次检验时间因素对双元孝道信念的可能影响。此部分所有模型皆以 HLM7.0 软件包之 HCM2 模块进行分析, 采用 REML 估计法。在统计模型设定上, 以 3 个嵌套模型逐步确认时期与世代的效应在不同控制条件下是否始终维持显著, 上述三阶段嵌套模型依序为: (1) 在个体与细格层次皆未放入任何解释变项的“基准模型”; (2) 在个体层次加入年龄与年龄平方作为解释变项的“年龄—时期—世代模型”; (3) 最后的“控制模型”则是在个体层次上再加入其他所有选用的人口解释变项, 并根据模型的依变项同时在个体层次加入另一种孝道作为控制变项, 例如当依变项为相互性孝道时, 则将权威性孝道加入作为控制变项。由于本研究对时期、世代与个体层次人口解释变项效果之比较聚焦于三者在台湾民众孝道信念总变异量上的相对解释比例, 因此个体层次所有人口变项的预测效果均设定为跨时期、跨世代皆相同(即固定效果)。由于目前模型仅限于讨论“个体层次解释变项”对依变项的固定影响效果, 因此分析时将其中属于连续变项者以组平减处理。至于细格层次的“时期”与“世代”在多层次分析中, 则以集群随机效应形式呈现(请参考表 2 之模型说明), 通过检验其变异数来确认时期与世代之效果, 变异数显著即表示不同时期组或世代组的残差随机效应在依变项上存在显著差异。

表 2 三阶段嵌套模型分析内容说明

	基准模型	年龄-时期-世代模型	控制模型
预测 变项	细格层次:无 个体层次:无	细格层次:无 个体层次:年龄、年龄平方	细格层次:无 个体层次:年龄、年龄平方、其他所有人口解释变项、相互/权威性孝道(为控制变项)
模型 内容	相互性/权威性孝道 $_{ijk} = \gamma_0 + \mu_{0j} + \nu_{0k} + \varepsilon_{ijk}$	相互性/权威性孝道 $_{ijk} = \gamma_0 + \beta_1$ 年龄 $+ \beta_2$ 年龄平方 $+ \mu_{0j} + \nu_{0k} + \varepsilon_{ijk}$	相互性/权威性孝道 $_{ijk} = \gamma_0 + \beta_1$ 年龄 $+ \beta_2$ 年龄平方 $+ \beta_3$ 性别 $+ \beta_4$ 婚姻状态 $+ \beta_5$ 教育程度 $+ \beta_6$ 家户每月总收入 $+ \beta_7$ 家户总人口数 $+ \beta_8$ 权威性/相互性孝道 $+ \mu_{0j} + \nu_{0k} + \varepsilon_{ijk}$
分析 重点	(1)时期与世代的残差随机效应是否显著。(2)从个体层次、时期细格层次、世代细格层次的残差随机效果变异数,探讨三者在二元孝道信念的总变异量上所占比的解释比例。	(1)个体层次加入年龄与年龄平方两预测变项后,期次与世代的残差随机效应是否改变(显著性与改变幅度)。(2)在控制世代与期次效应下,年龄对二元孝道的解释效果如何。	(1)再加入其他所有人口变项及孝道控制变项后,期次与世代之残差随机效应是否改变(显著性与改变幅度)。(2)在控制另一类孝道的影响及年龄、世代、期次效应下,各人口变项之解释效果如何。

注:(1)下标 j 代表第 j 个时期 ($j=1-3$), k 代表第 K 个世代组 ($k=1-4$), 下标 i 代表第 j 个时期与 K 个世代交叉分类形成之细格组中第 i 位受访样本。(2) γ_0 为全体受访样本之二元孝道平均得分, μ_{0j} 为时期 j 之残差随机效应, ν_{0k} 为世代 k 之残差随机效应, ε_{ijk} 为个体层次(嵌套在 j 时期与 K 世代下每位受访样本)之残差随机效应。(3)以上为个体层次模型与细格层次模型相加后实际运算用的混合模型。

三、研究结果

(一) 二元孝道信念相对重要性分析:描述统计与相依样本 T 检定

九题孝道测量题项与相互性、权威性两孝道向度之各期次得分平均数与标准偏差如表 3 所示。综合而论,尽管相互性孝道的测量题数较少,但无论从单题得分或孝道向度总分观之,各期次的相互性孝道得分平均数皆高于权威性孝道,且相互性孝道之标准差皆低于权威性孝道之标准差;进一步以两类孝道向度单题平均得分(即两向度的总分各自除以其测量题数)进行相依样本 T 检定亦可发现:相互性孝道的相对重要性在各期次皆显著高于权威性孝道(三期次的 t 值依次为 55.66、

表 3 二元孝道单题与向度得分之描述统计与跨期次得分差异比较

	二期五次(1994年)		三期五次(1999年)		六期二次(2011年)		跨期次 ANOVA	Post-hoc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F (2,4408)	Sheffe
RFP1 对父母养育之恩心存感激	3.51	.90	3.74	.57	3.89	.40	120.55 ***	
RFP2 无论父母对您如何不好仍善待他们	3.19	1.05	3.34	.87	3.55	.77	58.10 ***	
RFP3 奉养父母使他们生活更舒适	3.10	1.07	3.46	.77	3.67	.64	162.22 ***	
RFP4 父母去世不管住多远都亲自奔丧	3.55	.90	3.79	.55	3.94	.28	143.55 ***	
AFP1 放弃个人志愿达成父母心愿	1.62	1.32	1.92	1.26	2.22	1.19	78.94 ***	1994 < 1999 < 2011
AFP2 结婚后和父母/公婆住在一起	1.95	1.41	2.41	1.32	2.58	1.26	83.33 ***	
AFP3 为顾及父母面子为父母说些好话	2.23	1.30	2.69	1.16	3.30	.88	324.72 ***	
APP4 为了传宗接代至少生一个儿子	1.66	1.53	1.97	1.55	2.17	1.46	39.89 ***	
AFPS 做些让家族感到光彩的事	2.23	1.31	2.57	1.23	2.79	1.14	73.63 ***	
相互性孝道向度总分	13.36	3.28	14.33	2.06	15.05	1.57	179.35 ***	1994 < 1999 < 2011
权威性孝道向度总分	9.70	4.95	11.57	4.44	13.06	3.96	200.26 ***	
相互性孝道向度单题平均分	3.34	.82	3.58	.52	3.76	.39		
权威性孝道向度单题平均分	1.94	.99	2.31	.89	2.61	.79		
同期次二元孝道得分之相关	.50 ***		.49 ***		.45 ***			
同期次二元孝道平均分差异(T-test)	55.66 *** (RFP > AFP)		65.22 *** (RFP > AFP)		62.46 *** (RFP > AFP)			

注：(1)RFP为相互性孝道,AFP为权威性孝道。(2)向度单题平均分即向度总分除以测量题数,相互性向度总分除以4,权威性向度总分除以5。(3)*** p < 0.001。

65.22、62.46, $p_s < 0.001$)。上述分析结果一致显示,近17年来相互性孝道受台湾民众重视的程度不仅稳定高于权威性孝道,且多数民众对相互性孝道皆持肯定态度(得分离散情形较小),假设1得到支持,此结果反映出现代化历程对台湾孝道价值变迁造成的影响早已十分稳定,强调代间亲密情感的相互性孝道是当代台湾民众孝道观念的核心成分。

另一方面,以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检验各期次双元孝道信念得分差异之初步结果显示:台湾民众的双元孝道信念(无论单题或向度总分)在不同期次间皆存在显著差异,经 Sheffé 法事后比较更可看出,相互性与权威性孝道信念的重要性同样呈现逐期上升之趋势(详见表3)。时期效果虽在单因子变异数分析中达到显著,但考虑年龄、世代因素同时与个人双元孝道信念密切关联,因此仍需进一步控制年龄与世代因素的作用效果,以确认时期效应是否确实成立。

(二)双元孝道信念的“年龄—时期—世代”效果分析: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

为了同时比较“年龄—时期—世代”效果与其他重要人口变项对双元孝道信念的影响,此处分别以相互性、权威性两种孝道信念为依变项,采用多层次线性模式交叉分类随机模型进行系列嵌套模型比较,结果如表4所示。

在基准模型中,双元孝道信念的时期与世代效果皆达到显著水平:在相互性孝道上,时期与世代的变异数依序为0.52($p < 0.001$)、0.02($p < 0.01$);在权威性孝道上,时期与世代的变异数依次为2.77、1.14($p_s < 0.001$),亦即不同时期与不同世代的受访者对双元孝道信念的重视程度皆存在差异。其中两类孝道之时期随机效应一致呈现随调查期次/年度逐渐上升之趋势,由图1可更清楚看出时期随机效应在权威性孝道上显现出较强的上升幅度。至于世代的随机效应则在两类孝道信念上呈现出不同模式:权威性孝道信念的世代效果呈现逐渐下降趋势,即越年轻的世代越不重视权威性孝道;相互性孝道信念的世代效果则相对较弱,数据虽显示婴儿潮世代最重视相互性孝道(组效果量为0.13, $p < 0.001$)、Y世代最不重视相互性孝道(组效果量为-0.12, $p < 0.001$),但不同世代组间的效果量差距较小,由图2即可看出相互性孝道的世代效果并无明显起伏。从变异数组成的角度加以比较,时

期、世代与个体层次三者的残差变异量在相互性孝道得分总变异量上所占的解释比例依次为 8.4%、0.3%、91.3%，而权威性孝道的总变异量约有 11.9% 来自时期、4.9% 来自世代、83.2% 来自个体层次。换言之，整体样本在两类孝道得分上的差异主要是由个体层次的个别差异所解释，其次则受不同调查期次的时期差异影响，而世代差异的影响效果则最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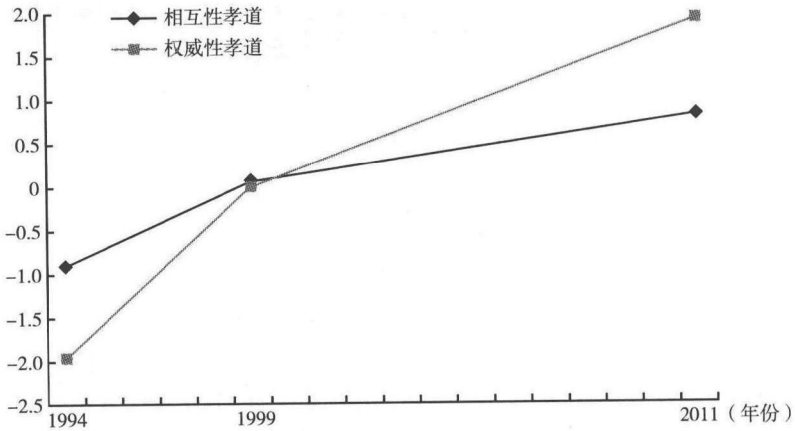


图 1 二元孝道在各时期之随机效应 (基准模型)

在年龄—时期—世代模型中，个体层次新增的年龄相关变项对相互性孝道皆无显著预测效果，不过年龄 ($b = -0.08, p < 0.05$)、年龄平方 ($b = 0.001, p < 0.001$) 在权威性孝道上皆呈现显著效果，综合两者回归系数可知，年龄在权威性孝道上大致呈现 U 型的非线性效果，最低点约为 25 岁 (以 $0.0836 / (0.00167 \times 2)$ 计算 U 型曲线反曲点)。另一方面，年龄相关变项的加入也使原本的时期与世代效果产生变化，其中二元孝道的时期效果虽仍维持随调查期次逐年上升之趋势，但与基准模型相比，其效果量已稍微减弱。而世代效果在两类孝道上则出现不同变化：权威性孝道的世代效果由基准模型中的“显著下降趋势”转变为“不显著” (世代变异数为 0.01, $p > 0.05$)；相互性孝道的世代效果则无明显波动，与基准模型同样呈现显著但微弱的效果，且仍以婴儿潮世代最为重视相互性孝道。为了方便与基准模型的世代效果相比较，这里将年龄—时期—世代模型中二元孝道信念的世代效果呈现于

图3;比较图2与图3可知,当年龄因素加入后,相互性与权威性孝道的世代效果逐渐趋同,世代差异对两类孝道信念受重视的程度皆无太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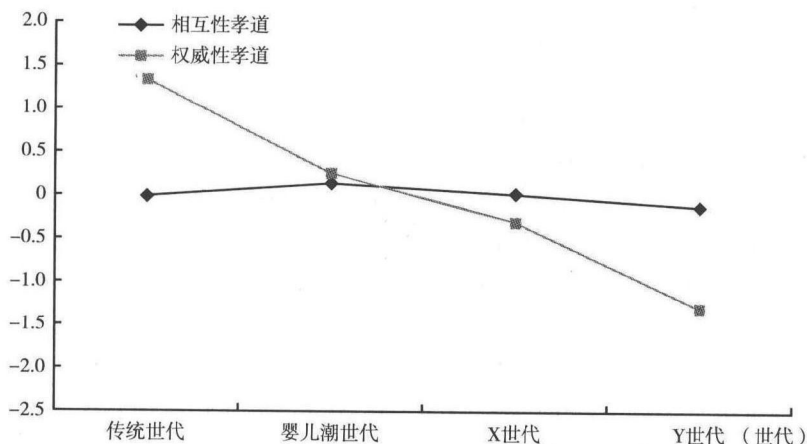


图2 二元孝道在各世代之随机效应(基准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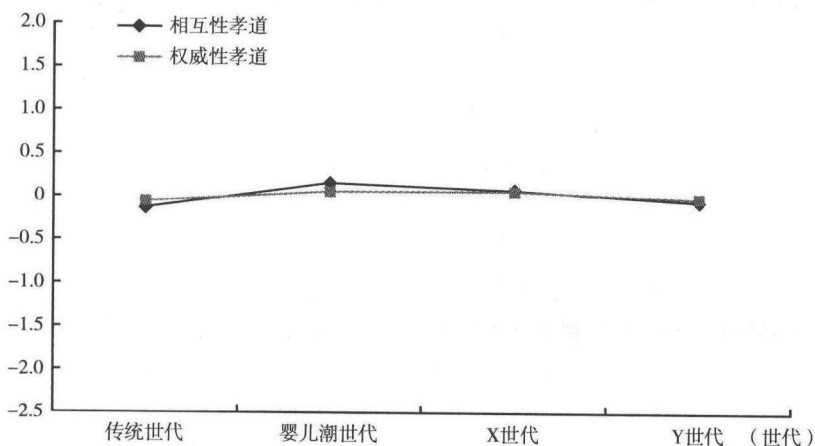


图3 二元孝道在各世代之随机效应(年龄-时期-世代模型)

在“控制模型”中,个体层次除了新增多个人口解释变项,也同时控制来自另一类孝道因素的影响。分析结果发现:在相互性孝道上,年龄效果仍维持不显著,而新增解释变项中仅个人教育程度(回归系数 $b =$

0.13, $p < 0.001$)与作为控制变项的权威性孝道($b = 0.27, p < 0.001$)达到显著,即教育程度越高者越重视相互性孝道;在权威性孝道上,则是除了婚姻状态外,其他所有人口解释变项与控制变项(相互性孝道)的效果皆达到显著水平,其中年龄($b = -0.09, p < 0.01$)与年龄平方($b = 0.001, p < 0.001$)的效果皆达到显著水平,其与权威性孝道之间也仍维持U型的曲线关系,惟U型曲线最低点与前一模型相较稍有改变,大约落在33岁左右;此外,男性($b = 0.40, p < 0.001$)、教育程度低者($b = -0.45, p < 0.001$)、家庭每月总收入较低者($b = -0.08, p < 0.05$)、家户总人口数较多者($b = 0.11, p < 0.001$)较重视权威性孝道。个体层次其他人口解释变项与控制变项的加入对时期与世代效应并未造成太大影响,二元孝道的时期效果量虽有些弱化,但仍维持显著(其在相互性与权威性孝道的变异数分别为0.35、0.87, $ps < 0.001$),且一致呈现随调查期次逐年上升。世代效应也与前一模型相同,在权威性孝道上无显著效果(变异数降为0.00, $p > 0.05$),在相互性孝道上则呈现显著却微弱的随机效应(变异数降为0.01, $p < 0.01$),由图4可看出,各世代对相互性孝道的重视程度其实并无太大差异。汇整上述三阶段嵌套模型分析结果可知:(1)年龄仅在权威性孝道上有显著的U型曲线效果(最低点约介于25-33岁),符合假设2-1的预期。(2)在世代效果方面,相互性孝道的世代效果在各模型中虽达到显著,但始终十分微弱,所占解释比例至多仅0.3%,而权威性孝道的世代效果在基准模型中虽如预期呈现随世代下降之趋势,但在后续两模型中皆转为不显著;综合而言,世代差异对二元孝道的影响效果有限,仅假设2-3得到部分支持,假设2-2则未获支持。(3)二元孝道的时期效果在各模型中皆显著,虽然其效果量皆随个体层次预测变项渐次加入而降低,但即使控制了世代、年龄、另一类孝道与其他人口变项的影响,两类孝道始终清楚呈现随时期演进而上升的变迁趋势(见图5),且如假设2-4之预期,权威性孝道之重要性随时期上升之幅度高于相互性孝道。(4)目前所有个体层次人口解释变项在二元孝道上的效果(包含显著性与方向),不仅与以往研究使用单一时间点数据的分析结果(叶光辉,2009a)大致呼应,亦支持假设3的预期,即各人口变项对权威性孝道的解释效果高于相互性孝道;换言之,相互性孝道普遍受到重视,权威性孝道则只在特定群体中(如男性、低教育程度者)较受重视,此部分结果也间接支持了相互性孝道的重要性相对高于权威性

孝道之假设(假设1),并突显出20世纪6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间现代化历程对台湾社会孝道变迁的影响效果仍相当稳固,是解读后续孝道变迁趋势的重要的基本脉络。鉴于在二元孝道上时期效果的显著性及解释比例皆更甚于世代效果,后续讨论将聚焦于比较两类孝道在时期效果上的异同,并尝试将这些变化与台湾新兴社会趋势做连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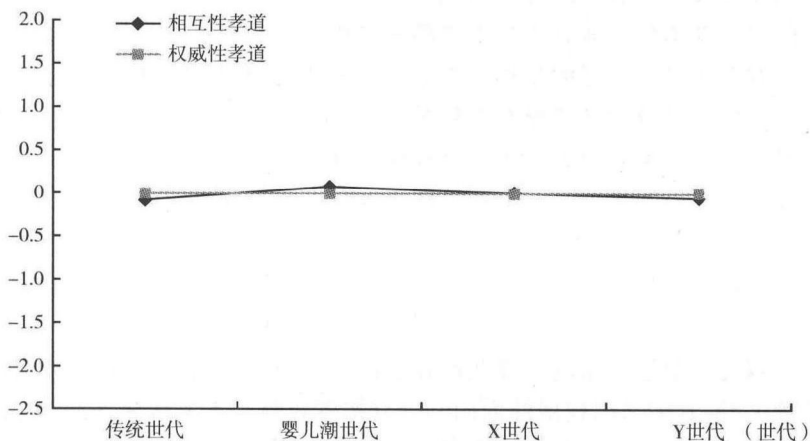


图4 二元孝道在各世代之随机效应(控制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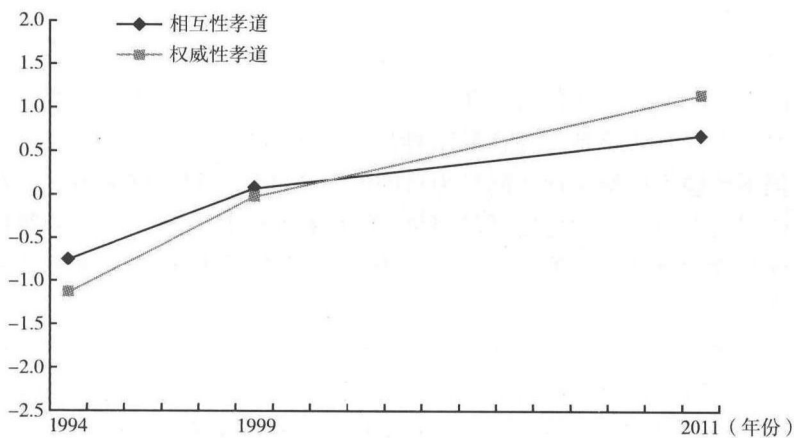


图5 二元孝道在各时期之随机效应(控制模型)

四、综合讨论与结论

(一) 孝道二元面向的变与不变

本文以孝道二元模型为架构,同时从“二元向度相对重要性之差异”、“二元向度各自的得分波动”等形式来探讨近期台湾社会孝道观念的变迁及其意涵。综合分析结果可知:自1994-2011年间,台湾民众的双元孝道信念兼具变与不变两大趋势。

双元孝道中不变的是相互性孝道的重要性始终高于权威性孝道,且即使以交叉分类随机模型严格控制时期与世代效应,人口变项在双元孝道上的解释效果差异仍与过往研究相同(参见叶光辉,2009a),一致反映出权威性孝道只在某些持传统保守态度或认同男性优势的族群中较受重视。因此,不同族群对双元孝道重视程度之相对差异所呈现的不变趋势,显示出现代化与民主化历程对孝道变迁的影响已相当稳定,相互性面向在台湾当代孝道运作中已居于核心地位。

双元孝道近年来的主要变动在于两类孝道受重视的程度皆随时期持续上升,其中又以权威性面向的上升幅度较高。本文认为,此一变化对应于由人口高龄化及经济不景气趋势共同构成的老人赡养问题,且预示了亲子代间关系本质的再次转型。由于高龄化趋势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尚在初期阶段,台湾当局目前的因应方向主要是通过政策倡导及学校教育体系同步强化代间伦理、家庭养老功能,其所倡导的孝道理念同时涵盖双元面向,因而呈现双元孝道受重视的程度一致上升;至于权威性面向的上升幅度稍高于相互性面向,可能来自此波政策对孝道价值之诉求较制式化且与外在脉络性压力结合,即使在提倡相互性孝道时仍不免隐含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的的规范性质。目前结果虽显示亲子代间关系有朝契约化发展的可能,但未来各种老人赡养与高龄照护具体政策之推行,仍可能为台湾民众孝道信念带来更深层而复杂的演变。

上述变与不变两大趋势并非彼此独立无关、亦非相互矛盾冲突,相反,双元孝道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消长转变是后续孝道变迁方向之基础。因此,解释晚近孝道变迁时,不宜只单独考虑孝道重要性跨时期的表层波动趋势,还必须同时参酌相互性孝道作为优势面向的脉络意涵,否则可能将双元孝道的同步上升趋势误解为“孝道变迁趋势朝保守主义方

向逆转”。惟有同时掌握变与不变两类趋势的基本关联,才可能对社会脉络因素对台湾民众孝道观念变迁的影响提出適切解读。

(二)台湾近期孝道观念变迁之脉络成因

由于高龄化与经济不景气趋势对民众孝道观念的影响较为复杂,未必等同这两项脉络因素的个别效应的线性加成结果。若进一步考虑相关政策方面的影响,更不易找到合适的具体指标来反映这些造成孝道观念变迁的脉络成因。因此,上述的正式分析中,并未纳入任何时期层次的解释变项(即该解释变项主要反映各时期在某特定社会条件上的差异,例如各调查年度的总体失业率)进行验证。为了替民众孝道观念变迁理论奠定初步基础,此处仍尝试选用一些可反映高龄化与经济不景气趋势之脉络指标,分别验证这些脉络指标的变化趋势与双元孝道持续上升的时期效应有所对应。实际分析则以原本的控制模型为比较基准,以确认个别脉络指针加入时期层次作为解释预测变项后,原本控制模型中的时期残差效果量是否降低、变化幅度如何。本研究的数据结构虽横跨 17 年,却仅包含 3 个调查时间点,易受特定社会趋势指标短期内的极端波动所影响,为了反映出台湾社会在老龄化、经济景气上较可信的长期变化趋势,在建构时期层次解释变项时,特别选用多样化的总体统计指标来代表上述两类脉络条件(各指标计算方式与数据详见台湾“内政部”统计查询网 <http://statis.moi.gov.tw/micst>)。由表 5 可知,目前选用的 4 种高龄化相关指标、3 种经济景气相关指针,均从时期层次对个人的双元孝道信念产生显著影响,且各回归系数的正负值皆与指标本身性质相对应,例如一般生育率为高龄化程度的反向指标,以各时期一般生育率的变化预测民众对孝道的重视程度时,其回归系数应为负值。整体而言,当调查年度的人口老化程度越高或整体经济景气越差,则民众的双元孝道信念皆越高,且在时期层次解释变项加入后,原本控制模型(仅纳入个体层次解释/控制变项)的时期残差效应量也大幅降低(相互性孝道的下降比例约 77% - 99%,权威性孝道则介于 69% - 100% 之间),显示原本欠缺明确解释原因的时期残差效应变异量已被这些解释变项之效果所取代,初步证实了双元孝道时期效应所呈现的持续上升趋势,的确与各时期人口高龄化、经济不景气两类社会结构条件的变动程度存在密切对应关系。然而,这两股近期社会趋势本身并不直接涉及价值观转型的运作,仅涉及奉养

父母此一具体规范内容,因此对于孝道变迁的影响不如现代化、民主化那么全面、直接,且仍有其他政策因素或相关脉络条件与两者相互交错,即使个别指标在统计上均可有效解释时期残差效应为何存在,仍不宜将之视为孝道变迁的直接成因,而仅能作为理解其变迁脉络的基底。

表 5 两类时期层次解释变项对二元孝道之回归系数及其加入后时期残差效应下降比例

依变项	回归系数数值(b)		时期残差效应下降比例	
	相互性孝道	权威性孝道	相互性孝道(%)	权威性孝道(%)
人口结构高龄化相关解释变项				
老年人口依赖比	.35 ***	.57 ***	91.43	96.55
人口老化指数	.03 ***	.05 ***	85.71	91.95
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	-.06 ***	-.10 ***	97.14	99.99
65 岁以上平均余命	.55 ***	.88 ***	97.14	99.99
经济景气相关解释变项				
经济成长率	-.50 ***	-.82 ***	88.57	95.40
失业率	.51 ***	.81 ***	99.43	99.99
家户平均可支配所得年增长率	-.29 **	-.43 *	77.14	68.97

注:(1) ** p < 0.01, *** p < 0.001。(2)时期残差效应下降比例之计算皆是与控制模型相较。

(三)研究限制与结论

本研究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探讨近 17 年来台湾社会孝道观念的变迁,且运用晚近发展的分析方式,由年龄、时期、世代等不同时间层次厘清孝道变迁情形。较可惜的是,不同期次的资料在测量题项内容上多有变更,因此目前选用的个体层次解释变项仅止于一般常见的人口背景变项,而无对应于二元孝道核心的理论解释变项(如:亲子关系质量、父母健康情形等)。事实上,与时期、世代两种细格层次的残差随机效应相较,个体层次的残差随机效应在二元孝道变异量上所占解释比例最高,即使加入人口解释变项后,个体层次残差随机变异量仍未明显下降,显示目前选用的人口变项并非影响二元孝道个别差异的关键变项,未来若能在个体层次纳入有关亲子关系或父母健康情形的解释变项,或许可为孝道变迁所隐含的代间关系转型历程提供更多的线索。

此外,本研究对世代的划分以反映本土社会历史发展脉络为优先考虑,与一般以固定年数间距为基础的世代区分方式有所不同,目前世代的组别数较少,因而隶属各世代组的样本人数相对较多,此种分组特性将造成各组标准误相对较小,即使个别世代组的效果已明显降低,仍易达到显著水平,例如权威性孝道的世代效果在年龄—时期—世代模型与控制模型中皆已转为不显著(见表3下方变异数组成字段),但每一世代组各自的残差随机效果量虽相对降低却仍维持显著,以及世代效果在基准模型中虽仅占相互性孝道总变异量的0.3%却仍达显著水平,这些结果可能都与世代组数较少有关。事实上,HAPC模型原就有其统计预设之限制,计量相关学者多半建议可就各种模型默认条件的不同组合进行系列分析(例如年龄、时期、世代三者可各自设定为固定或随机效应;或以额外信息限定或微调其中任一种效应的估计结果等),从中确认出较稳定的结果型态(Bell & Jones, 2013a)。由于本文焦点并非计量或方法论方面的议题,因而仅针对其他不同的世代分类方式进行额外分析(分别以5年、10年作为世代分组跨距),以确认目前分析结果的稳定性。此项额外分析结果亦显示,无论是以5年(共12组)、10年(共6组)作为世代分组跨距,或基于台湾本土社会脉络所区分出的4个世代组,3种世代分类方式所得到的分析结果皆相当一致:世代效应在二元孝道上所占解释比例都是最低的,且其在年龄与其他人口变项加入后效果更加微弱或转为不显著;而时期效应在二元孝道上均始终维持显著,并清楚呈现逐年上升的变迁趋势。由于本研究主旨在于确认时期效果是否存在及其变化趋势,既然单因子变异数分析已显示时期效果存在,时期因素在一系列HAPC模型中也都维持一定程度的解释量,且以不同的世代分类方式进行分析仍得到类似结果,上述两项限制对于主要研究发现应不致造成太大影响。未来若欲对造成二元孝道随时期变化之多重成因提出进一步验证,或同时确认各种个体层次解释变项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效果有无变化,则应尽可能增加时期与世代各自的组别数,以满足模型设定上的统计要求。

与以往仅以单因子变异数分析处理时期效果的方式相较,本文采用的HAPC模型在确认时期效果上更为严谨,应有助于分离不同层次的时间效应。然而此一新兴方法仍有其限制,并未彻底解决因年龄、时期、世代之完全共线性所导致的模型识别问题(Bell & Jones, 2013a),例如时期、世代效应未必能由细格层次的残差随机效应完全涵盖,且时

期与世代间可能仍有某些潜在的交互关联(Bell & Jones, 2013b);因此在解释时期、世代两者之相对重要性时宜有所保留,或通过基于不同统计预设条件或变项分类方式的系列模型来确认分析结果的稳健性。目前虽有越来越多根据多层次线性模式原理所提出的各种“年龄—时期—世代”分析模型,如葛拉索(Grasso, 2013)所运用的 GAMMs (generalized additive mixed models),但这些方法仍分别奠基于不同的统计预设,因而各有其限制与利弊。目前 HAPC 模型在统计方法上的争议仍无定论,尽管模型发展者已针对相关质疑提出初步回应(见 Yang & Land, 2013),但其后续发展如何、能否与其他估计方式相似的模型整合出更强韧的年龄—时期—世代分析方法,则有待计量学者更深入的探究。

整体而言,本文采用可反映社会变迁意涵的孝道二元模型作为概念架构,针对调查资料实际涵盖的时间范围,参照台湾本土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在理论层次上提出台湾社会晚近时期孝道观念变迁之具体假设,并得到实证证据支持,使孝道观念变迁的讨论扩展至新近社会趋势及相关政策的影响。尽管一般价值变迁研究多半聚焦于确认宏观(社会结构层次)的成因,然而来自社会结构层次的影响力终究仍需透过个人的能动性加以实践,后续研究除了可继续善用交叉分类随机模型在单一模型中整合个体、时期与世代三种层次的统计特性,厘清宏观、微观不同层次间交互牵连的作用关系外,也应多关注此分析方法的后续发展,或是否有其他新发展的模型可适用于以个体为单位之重复性横断面数据,以期能对不同层次时间效应提出更细腻、有效的分析与解释。

参考文献:

- 陈锦燕,2006,《战后台湾国民小学教科书中的民族建构(1968-1989)》,台湾国立新竹教育大学区域人文社会学研究所硕士论文(未出版)。
- 傅仰止、张晋芬主编,2007,《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计划第五期第二次调查计划执行报告》,台北:“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
- 台湾“行政院”经建会,2006,《2005-2051年人口推估》(<http://www.cepd.gov.tw/ml.aspx?sNo=0000455&key=&ex=%20&ic=>)。
- 台湾“行政院”主计处,2005,《人类发展指数(HDI)之国际比较》(<http://www.stat.gov.tw/public/Data/510181662971.pdf>)。
- 台湾“教育部”,2010a,《教育部推动“祖父母节——搭起世代传承情”实施计划》(<http://>

- moe. familyedu. moe. gov. tw/ezcatfiles/d001/img/img/94/137245964. pdf)。
- , 2010b, 《教育部全国孝亲家庭月——99年孝亲家庭楷模选拔及表扬活动实施计划》([http://web2. cmcs. tn. edu. tw/modules/newbb/dl _ attachment. php? attachid = 1269913530&post_id = 598](http://web2.cmcs.tn.edu.tw/modules/newbb/dl_attachment.php?attachid=1269913530&post_id=598))。
- 台湾“内政部”统计处, 2010, 《内政统计年报——老人福利、十年长照服务成果》([http://sowf. moi. gov. tw/stat/year/y04 - 16. xls](http://sowf.moi.gov.tw/stat/year/y04-16.xls))。
- 林文瑛、王震武, 1995, 《中国父母的教养观: 严教观或打骂观?》, 《本土心理学研究》第3期。
- 林秀玲, 2000, 《高中教材关于刘铭传与后藤新平对台湾现代化影响之探讨》, 《历史教育》第7期。
- 陶希圣, 1983, 《孝道与孝行研讨会发言纪录》,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孝道与孝行研讨会论文集》, 台北: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
- 萧新煌, 1995, 《新人类的社会意识与社会参与》, 《劳工之友》第535期。
- 徐复观, 1975, 《中国孝道思想的形成演变及其在历史中的诸问题》, 《中国思想史论集(第四版)》,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 杨国枢, 1985, 《现代社会的新孝道》, 《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19期。
- 叶光辉, 2009a, 《华人孝道二元模型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本土心理学研究》第32期。
- , 2009b, 《再论华人孝道二元模型的几个关键性议题》, 《本土心理学研究》第32期。
- 张桂霖、张金鹗, 2010, 《老人居住安排与居住偏好之转换: 家庭价值与交换理论观点的探讨》, 《人口学刊》第40期。
- 周玉慧、朱瑞玲, 2008, 《变迁中的台湾民众心理需求、疏离感与身心困扰》, 《台湾社会学刊》第41期。
- Bell, A. & K. Jones 2013a, “Bayesian Informative Priors with Yang and Land’s Hierarchical Age-period-cohort Model.” *Quality and Quantity* (Published online on 25 December 2013, DOI:10.1007/s11135-013-9985-3).
- 2013b, “Don’t Birth Cohort Matter? A Commentary and Simulation Exercise on Reither, Hauser, and Yang’s (2009) Age-period-cohort Study on Obesity.”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http://dx. doi. org/10. 1016/j. socscimed. 2013. 09. 004](http://dx.doi.org/10.1016/j.socscimed.2013.09.004)).
- Bengtson, V. L. 1993, “Is the ‘Contract across Generations’ Changing?” In V. L. Bengtson & W. A. Achenbaum (eds.), *The Changing Contract across Generations*.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Chou, R. J. A 2011, “Filial Piety by Contract? The Emergence, Implementation,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Family Support Agreement’ in China.” *The Gerontologist* 51(1).
- Giddens, A. 1992,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Cambridge: Polity.
- Cohen, J. 1988,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2nd ed.). Hillsdale, NJ: Erlbaum.
- Grasso, M. T. 2014, “Age, Period and Cohort Analysis in a Comparative Context: Political Generation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Repertoires in Western Europe.” *Electoral Studies* 33(1).

- Schwadel, P. 2013, "Changes in Americans' Views of Prayer and Reading the Bible in Public Schools: Time Periods, Birth Cohorts, and Religious Traditions." *Sociological Forum* 28(2).
- Tung, A. -C. , C. Chen & K. -C. Liu 2006, "The Emergence of the Neo-extende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Taiw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32.
- Wong, O. & B. Chau 2006, "The Evolving Role of Filial Piety in Eldercare in Hong Kong."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34.
- Yang, Y. 2006, "Bayesian Inference for Hierarchical Age-period-cohort Models of Repeated Cross-section Survey Data."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36.
- Yang, Y. , & K. C. Land 2006, "A Mixed Models Approach to the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of Repeated Cross-section Survey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Data on Trends in Verbal Test Scores."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36.
- 2008,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of Repeated Cross-section Surveys; Fixed or Random Effects?"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36.
- 2013, "The Statistical Properties of the Intrinsic Estimator for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Retrieved on December 31, 2013 (http://yangclaireyang.web.unc.edu/files/2013/07/ResponseToLiyinLuo-2013_APOnline.pdf).
- Yeh, K. -H. 2003, "The Beneficial and Harmful Effects of Filial Piety: An Integrative Analysis." In K.-S. Yang, K.-K. Hwang, P. B. Pederson & I. Daibo (eds.), *Progress in Asian Social Psychology: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Contributions*. Westport, CT: Praeger.
- Yeh, K. -H. & O. Bedford 2003, "A Test of the Dual Filial Piety Model."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6(3).

作者单位: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曹惟纯)
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台湾大学心理学系及研究所(叶光辉)
责任编辑:杨 可

that the break between modern knowledge and local knowledge in school education leads to the academic difficulties of Dai students and the problems of dropout. A network of educational governance among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the school, the village and the family is established by combining the target-oriented responsibility system and the campaign-style governance. The outside governance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inside governance of the school reinforce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governance technology becomes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and sophisticated. Although the governance cost is quite high, this governance system hasn't solved the dropout problem, which leads to the involution of educational governance.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under Population Ageing: Analysis on the changes in filial piety in Taiwan society from 1994 to 2011

..... *Cao Weichun & Yeh Kuang-Hui* 116

Abstract: Using the Dual Filial Piety (namely reciprocal and authoritarian filial piety) Model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changing trends of the dual filial piety in Taiwan from 1994 to 2011 and then interpreted its impl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context of population ageing.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time effect with repeated cross-sectional data in a more rigorous way, we conducted an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with cross-classified random-effect model (or the so-called hierarchical age-period-cohort model, HAPC model) which allows distinguishing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s of the temporal dimensions of age, time period, and birth cohort to the variance in social phenomena. Results indicated: (1) The importance of both reciprocal and authoritarian filial piety has increased steadily during 1994 to 2011; (2) HAPC models demonstrated that the changes in the dual filial piety were both due to time period changes rather than birth cohort; (3) The age effect was only significant for authoritarian filial piety. Finally,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rising trends in the dual filial piety in Taiwan and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time period effects and some macro social trends (such as population ageing) were discussed.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Industries: A case study based on Sidong county

Feng Meng 145

Abstract: Taking a farming county in Northeast China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tries to reveal and analyze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s in creating local industries. The author finds that in the local political market, a set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and incentive structure has been established to measure government officials' performa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and all levels of